

“钢琴诗人”傅聪谢幕，音乐与家书仍“绕梁”



即使八十高龄，傅聪还是一位音乐上的苦行僧。他总是吃完早餐后到音乐厅练琴，一直练到下午六点半，吃一点点心，用热水泡手，再小睡十分钟，就登台演奏

你想象不到像他这样年纪、这样成就的音乐家，是这样刻苦地练琴。这种对音乐的全然投入、奋不顾身，或许就源自《傅雷家书》中贯穿始终的“旋律”——要永葆赤子之心

本报记者孙丽萍

当地时间 2020 年 12 月 28 日，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 86 岁。消息传来，国内音乐界为之扼腕痛惜。而在网络上，《傅雷家书》的读者对这本“成长启蒙书”的温情记忆，亦如潮水般涌动不息。

晚年：常把“阿拉爷讲、阿拉爷讲”挂嘴边

“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他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音乐家！”傅聪逝世，国际著名的阿格里奇基金会在网络上发出追思与评论。

在钢琴家郎朗眼中，傅聪是“古典乐坛里的一股清流，也是一种精神灯塔”。

傅聪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的长子。1934 年，傅聪出生于上海。酷爱艺术的父亲傅雷，学贯中西，当时拥有一座上海知名的书房，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于长子傅聪，他寄托了全部的爱和毕生的文艺理想加以培养。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不会吵，也不打瞌睡。”

发现傅聪有一双“音乐的耳朵”，傅雷让他学习钢琴。幼年时的傅聪，幸运地师从远东第一交响乐团——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的意大利指挥家、钢琴家梅百器，在其门下受教。但为了反抗父亲，他一度中止学琴。他自称，直到 17 岁之后“才真正下功夫练琴”。

1954 年，傅聪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钢琴教育家杰茨基教授，并于 1955 年获得“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演奏大奖，在国际古典乐坛崭露头角。正是在这段时期，傅聪与父母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后来被弟弟傅敏发现，整理出版。这就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里有艺术启蒙、音乐鉴赏；有成长之道、家国情怀，从为人处世到治学态度，点点滴滴、无微不至。阅者无不惊叹：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可以如此境界高远、宏大开阔，又可以这般“唠唠叨叨”，念兹在兹。

“心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沉浮，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的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在这部家书中，父亲傅雷重于书斋，向着远在天涯的游子傅聪敞开灵魂，将艺术的灵犀和人生的感悟一一坦白、全然托付。曾翻译过罗曼罗兰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傅雷，常常以“成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的人”自勉并激励傅聪，希望他在精神上追求至纯至美，又能够拥有刚强的生命力。

毋庸讳言，父子之间也会有矛盾和冲突。以严厉和性格刚烈著称的傅雷，俨然一位“虎父”。少年心气的傅聪，也曾承受不住父亲巨大的期望和严格的管教，尝试叛逆，甚至出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自己经常和父亲发生矛盾，跑出家门，轮流躲在爸爸的几位好朋友家里“避风头”。

但更加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傅雷家书》，父亲傅雷的灵魂，深刻镌刻在傅聪的音乐之中。傅雷热爱东西方古典艺术，并且具有极高的鉴赏力。而傅聪自称为“古典乐的守门人”，将他对音乐的理解表达建筑于人类灿烂古典文明的高峰之上，并守护着这些先行者的秘密。

傅雷以人类古典文明的精华滋养傅聪的心灵。他在家书中反复告诉傅聪：“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钢琴家。”

这谆谆教诲正是傅聪的“精神灯塔”。据友人回忆，晚年傅聪常把“阿拉爷讲、阿拉爷讲”挂在嘴边。他感叹，何其幸运，父亲将他当成了一个朋友、一个知心的同道中人来倾诉心情、切磋



2006 年，傅聪在上海音乐厅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

上海音乐厅提供

艺术，父亲将他视为了“在这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父亲给我的家书、给我的感受，是一种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大写的爱（‘LOVE’）”。傅聪曾说。

授课：总是一袭唐装，讲地道的上海话

在国际乐坛，傅聪的名字紧密地和“肖邦”联系在一起。傅聪在写给父亲的家书中提到：中国人诗词中含蓄的、浪漫的家国情怀像极了肖邦的内心。

从小浸染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之下的傅聪，常以一颗玲珑剔透的“中国心”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他曾说：“莫扎特的音乐里有一种大慈大悲。莫扎特全部都是爱，这一点和贾宝玉是一样的！莫扎特又像孙悟空一样千变万化。你给莫扎特一个主题，他就能编，要怎么编就怎么编，而且马上就编。他俏皮极了，这就是孙悟空的本领！”

关于傅聪的音乐，还有一段轶事。一次音乐会后，有人从傅聪演奏的肖邦夜曲里听到了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听闻这评论，傅聪激动非常。

无论是澎湃的舞蹈性的生之欢

乐，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凉、“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都充溢在傅聪的音乐中……对中国传统诗性文化的深深眷恋和对西方古典音乐的不懈求索，共同成就了这位被《时代》周刊赞誉的音乐家。

“一枝犹负平生志，归去何曾胜不归。”改革开放后，祖国的大门向傅聪敞开。思乡情切的傅聪自此频繁归来，几乎每年都要在国内举办音乐会，还在国内著名音乐学府参与教学。

沪上乐评人李严欢回忆说，每一次傅聪归国举办音乐会，都是人满为患、气氛热烈，成为一时城中盛事。“他回来演出的很多音乐会上，都会演绎肖邦的《玛祖卡》。傅聪演绎的肖邦如此诗意。可以说，从他的琴键上流淌出的，是一首首舞蹈的诗，是演奏者本人心灵澎湃的诗。而傅聪晚年演绎的肖邦夜曲，则有一种巨大的悲剧情怀。这悲凉源自他本人的命运、以及他对古代中国古典诗词的感受。”李严欢说。

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办班的场景，令许多人记忆深刻。他穿唐装，授课中说地道上海话，一边弹、一边唱着旋律，手把手教授学生，那形象正是一位去国怀乡的中国长者。

钢琴家郎朗记得，傅聪给他最大的激励在于中国文化方面，“我清楚地记得 2001 年我在伦敦首演结束时，

傅聪先生满含热泪地过来与我拥抱。他会亲自给我爸打电话，叮嘱让我多读中国文学，推荐我读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这都成为我在日后演奏古典音乐时的精髓所在。”

家国情怀，从《傅雷家书》注入傅聪的身心。而漂泊海外的傅聪，恐怕已将这乡愁化为一种“永恒的悲剧性的诗意”，融入琴声。

台上：是音乐“苦行僧”，不是“大师”

“2014 年 11 月 7 日，傅聪老先生好像过往一样，迈着稳健而坚定的脚步，走向星海音乐厅的舞台。这是他一直喜欢的舞台，每次来，他总是长时间弓着身子在这里独自练琴。”长期主办傅聪国内音乐会的广州左岸色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洁这样回忆。那是傅聪在祖国的最后一次巡回音乐会。

即使八十高龄，傅聪还是一位音乐上的苦行僧。

在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傅聪反复强调，他不喜欢做“大师”：“对我而言，音乐就是爱，就是一辈子的追求。”

方洁记得，傅聪练琴特别认真。每次从上海家中出发去机场，总是要拖到最后一刻，反复恳求“再让我练 10

分钟”。他总是吃完早餐后就到音乐厅，一直练琴到下午六点半，吃一点点点心、用热水泡手、再小睡十分钟，就登台演奏，将完美的音乐呈现给听众。

从 1998 年开始，乐评人李严欢几乎没有错过傅聪在国内的每一场音乐会。他还记得，15 岁那年，去倾听大师的现场演奏时那种“小粉丝的心情”。

“看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心中涌起的念头就是——我终于看见了一个活在书本上、录音中的传奇。”李严欢说。

李严欢也曾看见过傅聪“传说中的现场练琴”。“他是怎么练？当天晚上举办音乐会，下午他到音乐厅坐下来走台时可能还不到一点钟。他的练习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傅聪会先把肖邦 24 首练习曲从头到尾慢练一遍，一个一个音练……你想象不到像他这样年纪、这样成就的音乐家，是这样刻苦地练琴。”

“随后，他下一下台、抽几口烟斗。很快的速度，他又上台，将晚上的音乐会曲目再慢练一遍。这时已经是晚上 6 点钟左右。老先生吃很少一点东西，就又上台了。”

傅聪一生都是如此，沉浸在音乐世界里，每日精进，从无懈怠，永不止息。他逝世后，一位友人在朋友圈感叹：“终于不再练肖邦 24 首练习曲了……终于达到了完美啊！”

傅聪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在音乐里没有傅聪，只有音乐。这种对音乐的全然投入、奋不顾身，或许就源自《傅雷家书》中贯穿始终的“旋律”——要永葆赤子之心。

音乐由心而发，一切旋律都是心曲。纵使造化弄人，傅聪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赤子”。

2004 年，傅聪出版访谈体自传《望七了！》。2014 年，傅聪在国内举办八十大寿音乐会。这些举动，在音乐界人士看来，都像在预演一种“庄重而充满仪式感的告别”。

在八十大寿音乐会上，傅聪演奏了他毕生喜爱的六位音乐家作品，分别是莫扎特、舒曼、海顿、德彪西、贝多芬和肖邦。李严欢记得：“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舒曼、贝多芬晚年是较少出现在他音乐会中……当时人们都有一种感受：好像傅聪想将他熟悉的、喜爱的音乐家，都一一拿出来，弹给听众，像是把自己一生演奏的精华集中展现。”此次演出之后，傅聪告别舞台。

2020 年的冬天，曲终人散，传奇谢幕。

词：病人等得久了，离社会也就远了。香港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系主任曾永康认为，在内地的偏远贫困地区，医疗设施不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健全，而且居民居住分散，离医院较远，社区职业治疗康复的需求巨大。

回访 6 年，邓健聪眼中的鲁甸也有了巨大的改变。震后初到鲁甸，满是泥巴的糟糕路况增添了邓健聪一行驱车前往病人家中的困难，病患就像孤岛散落在茫茫大海。

从 2017 年开始，邓健聪发现路好走了：昆明到鲁甸的公路通车了，村与村之间也铺上了水泥路，车窗外，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社区康复不单单是医学技术，跟当地的教育、经济水平都有关。鲁甸基础建设逐渐完善，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顺利。”

“积极协助健全及残疾人士改善生活”是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学生们的抱负和使命。截至目前，理大超过 130 名学生参与“爱无疆”团队，为鲁甸及周边地区约 110 名残障人士提供康复治疗服务。团队每年至少去两次鲁甸，在 2 周的时间内，为病患提供细致的治疗服务，制定详密的康复计划。服务结束后，师生们会组织学术讲座，和北京、上海、四川、福建等地高校及机构分享社区康复的经验。

“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可以帮助内地需要帮助的人，不仅仅只是改变他们当时的情况，而是对他们的人生都产生影响。”即将从理大职业治疗学专业毕业的李舒平说，她在支援项目中为许多残障儿童提供服务，希望以后能从事儿童康复治疗工作。

新华社香港 1 月 3 日电（记者朱宇轩）2014 年 12 月，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 6.5 级地震发生 4 个月后，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职业治疗临床导师邓健聪第一次来到震后灾区。震中龙头山下列着排排救灾帐篷，不少受伤的灾民还在恢复期，有的双手无法灵活伸开，有的还不能正常行走。

面对讲陌生方言的伤患，邓健聪有点措手不及。短暂慌乱后，他迅速和治疗团队逐一检查每位病患的具体伤情，提供桌边椅、支架等器械，辅助伤员学习康复训练，帮助他们恢复行走、站立等日常活动。“病患的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职业治疗师需要为他们提供中长期康复治疗，帮助他们再次融入社区。”

职业治疗师，在内地被称为作业治疗师。世界职业治疗师联盟将其定义为：通过帮助人们参与工作、学习、娱乐等职业活动而促进其健康和安适的专业。地震过去 6 年，邓健聪和理大“爱无疆”学生团队定期回访鲁甸及周边地区的残障人士，践行职业宣言。

帮助病患再次“长大”

鲁甸地震后两年，邓健聪和四川大学-香港理大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作业治疗课程的硕士生为当地伤残人士提供持续康复治疗。2016 年，学生们毕业了，奔赴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但康复治疗不能停，邓健聪决定带领理大职业治疗学专业的本科学生重返龙头山。

2016 年夏天，邓健聪和同事黄家强驾驶两台车，载着 12 名学生、一车的行李和康复器械，从成都驱车近 12 小时，顺着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到这个位于云南省东北的贫困县城。“爱无疆”是理大学生们给支援鲁甸团队起的名字。头发乱糟糟的，也没有洗脸，整个



左图：香港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系主任曾永康接受采访。
右图：香港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职业治疗学学生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床褥上——这是师生们见到永伟的第一印象。

2016 年 1 月一场车祸后，永伟颈椎永久受损，颈部以下只能控制小部分手臂。洗脸穿衣吃饭，这些简单的动作永伟再也做不到，连去洗手间也只能靠妈妈背，仿佛初生的婴儿。

年事已高的永伟妈妈照顾永伟时扭伤了腰，担心伤病加重，无法照顾儿子。永伟看在眼里，认真地告诉“爱无疆”团队，希望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不用妈妈操劳照顾。

听取永伟的心愿后，邓健聪和学生们开始着手搭建居家康复环境：永伟原先使用的轮椅陈旧且重，团队免费为他配备了一个轻便的轮椅；师生们制作了一件绳梯工具，永伟用手腕攀着绳梯支撑自己起床；团队还提供了拉绳等生活辅助工具，方便永伟自

己做日常康复训练……

永伟再一次“长大”了。他在车祸后第一次尝试借助工具刷牙、梳头、吃饭……在团队的记录镜头里，永伟慢慢拧干一条洗脸毛巾，团队成员们围着他惊喜欢呼，永伟妈妈也欣喜地笑了，眼角隐约有泪光。

“康复是一种过程，不是一颗药，需要时间每天进步一点点。”学生们这样鼓励永伟。

心灵修复师

接触“爱无疆”团队前，家住龙头山的胜巧险些以一瓶农药结束自己不到 30 岁的生命。

2016 年，晒花椒的胜巧不慎从 3 米高的二楼跌到地面，诊断结果是“胸椎永久损伤”。胜巧不仅没办法照顾儿

子，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完全依赖丈夫，一家三口经济压力骤增。

“一了百了”的想法成了缠绕胜巧的梦魇。

团队成员十分担忧。他们不仅为胜巧准备了站立架、力量锻炼带、手推轮椅等康复训练器械，初见胜巧时还送给她许多种类的花草和种子。起初，胜巧并没有热情回应团队的关怀，师生们用“耐心”一点点打开了她的心扉。

“沟通是最重要的。沟通是接触病人的第一步，如果沟通不畅，病人不愿意分享、不信任治疗师，后续治疗很难展开。”团队成员李颖东说。

经过团队的悉心照顾和指导，胜巧能用电饭煲煮饭了，对丈夫的依赖减少了。“第一天自己起来，空气真好。”胜巧在朋友圈写到，配图是家门前景盛的枝叶，远处龙头山苍翠。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内地医疗纪录片《人间世》有句台